

年近百岁寻找真理真师

周汝昌

我带有自传性的文字已然不少了,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说明我是一名村童,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家无藏书,从小爱看书本儿却没什么书可翻,心中由怅惘而感到一种苦闷,甚至可以说是痛苦。我这名村童不知何故,没有与学术打交道的任何条件,却梦想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点学识的人。因此,羡慕有学之人,偶尔碰到一篇与学术有关的文章,便如同得到一份美味佳肴一般,如饥似渴,爱不释手。

我生逢乱世,求学读书的历程可谓百般坎坷困难。直到而立之年,这才真正地进入了一座有名的学府“燕园”。我的“治学”是从这儿才开始的。但是彼时燕园的名师已经都归“隐退”,要想治学,全凭个人摸索,没有真正的指

导、引路可言。就是如此,居然也就“治”起“学”来,其结果是学外文而译成了陆机的名作《文赋》;同时,对《红楼梦》、曹雪芹的研究已然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这更是盲人瞎马,没有任何指向,没有已定的理想目标……那时我的心情又增加了一份学术饥渴,就是想读名家论学的文章,可是所遇也不很多。

以上是说往事。今年我已是九十四岁之人,从七十年代两目损伤,读书之缘接近于零,而即使有了一点机会,“看”到的文章大多是以名词概念的堆砌为主要方式,加上一点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往往是一条简单的直线,枯燥死硬,毫无学术的生机命脉可言。

最近,我“听读”了李泽厚与

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这是一篇令人拭目之重要文章,看看他们二位的治学、论学,真是通俗而简明,热情而又恳切,他们用不多的篇幅,却告诉了我们如许丰富、透彻的治学、论学的典范示例,这真使我这个从小失学、慕学之人惊喜不已,引用我先生的语言来表达这里就没有这种宝贵的“恳切”之美、“恳切”之情。

关于“恳切”,《红楼梦》七十八回里贾政评论宝玉的《姽婳将军词》时给了一点评语:“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恳切”二字在经典文学名著中出现,而且运用到文化问题上的例子,以此为第一佳例。

“恳切”二字,这个普通的词语好像与学术和创作都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而经过雪芹这么一用,我越品味越觉得它很重要。这儿我不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和启功先生讨论过《兰亭序》的问题,我们为此有几首小词唱和;启功先生的一首开头就说:“襁褓人昭陵,定武临隔壁听。”启先生的诙谐风趣随处可见,他是批评历来把“定武兰亭”强派给欧阳询的看法,并加以讥讽,说是“隔壁”听来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指出这些人没有任何研究,就凭着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作出了大量“鹦鹉学舌”的论文。这种“隔壁”听来的话与“恳切”正为相反,所以不真又不深。而李泽厚先生评论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大师时,那几句话如此简明,如此中肯,这才真够得上“恳切”二字。试问:不是真正深入作了学问的人,能够说出这样“恳切”的话来吗?

行文至此,我不禁胆子变得大起来,我想这样说:你如果想知道某人的那种大论文是真正的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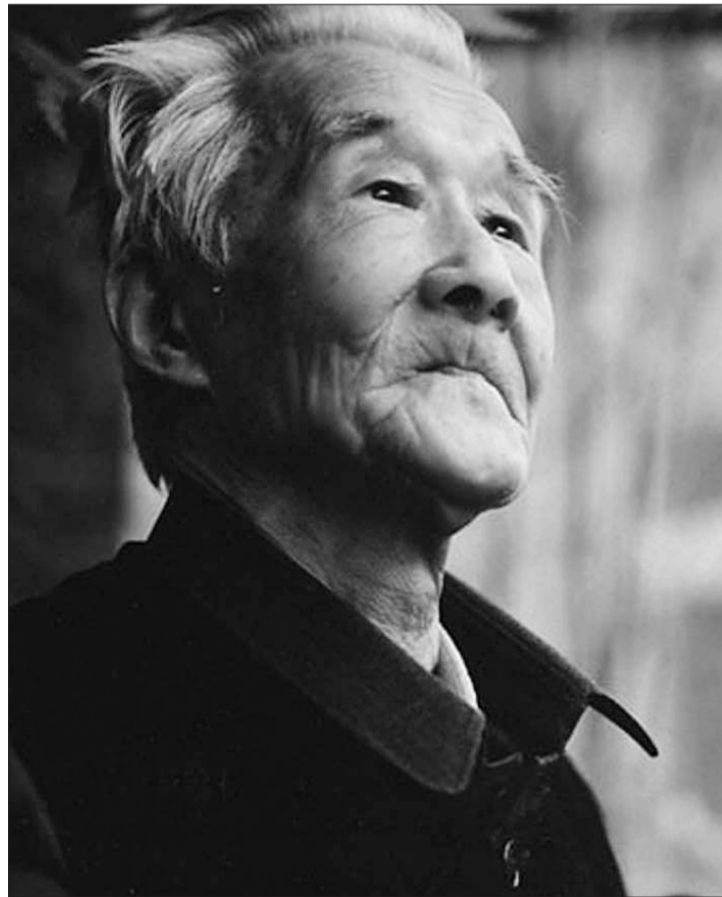
赏,并给予评价,这就值得令人做一番深思了。

读李泽厚、刘绪源两位先生的问答文章,是一种令我心存感激的享受经历,同时还有一种语言表达的享受,就是“恳切”二字。语言的恳切情感是大学者、仁人君子的美德。什么是“恳切”?“恳”就是真诚,“切”就是渗透。没有真实学问的假学者,往往没有与人为善的好心肠,他们的语言表述里就没有这种宝贵的“恳切”之美、“恳切”之情。

关于“恳切”,《红楼梦》七十八回里贾政评论宝玉的《姽婳将军词》时给了一点评语:“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恳切”二字在经典文学名著中出现,而且运用到文化问题上的例子,以此为第一佳例。

“恳切”二字,这个普通的词语好像与学术和创作都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而经过雪芹这么一用,我越品味越觉得它很重要。这儿我不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和启功先生讨论过《兰亭序》的问题,我们为此有几首小词唱和;启功先生的一首开头就说:“襁褓人昭陵,定武临隔壁听。”启先生的诙谐风趣随处可见,他是批评历来把“定武兰亭”强派给欧阳询的看法,并加以讥讽,说是“隔壁”听来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指出这些人没有任何研究,就凭着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作出了大量“鹦鹉学舌”的论文。这种“隔壁”听来的话与“恳切”正为相反,所以不真又不深。而李泽厚先生评论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大师时,那几句话如此简明,如此中肯,这才真够得上“恳切”二字。试问:不是真正深入作了学问的人,能够说出这样“恳切”的话来吗?

行文至此,我不禁胆子变得大起来,我想这样说:你如果想知道某人的那种大论文是真正的治



周汝昌

人们见了,我最发的一问就是:你怎么走上了红学的道路?既然大家对此话题颇欲一闻其来由缘故,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陈说一遍,详略虽殊,事情粗具——大家的好奇心让我也深感这原来不是一件“小事”。我治红学,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两者相交,适成一种历史文化万象中之象。

如今且说《懋斋诗钞》。

如果把发现此书一事孤立起来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简单了。苦度八年抗战、沦陷之后,1947年之秋于百般艰难曲折中重返燕园以续未完之学业。其时家四兄菽世途蹇顿,失业家居,寂寞无聊中,以一部“亚东”版《红楼梦》(借到的旧书)遣闷。他读卷

我的红学开端

周汝昌

先说“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真正关系之微妙难以尽究,最是耐人寻味了。比如说,我的红学开端是由于发现了胡适先生久寻无获的《懋斋诗钞》,这是很大的偶然性现象;但我不到燕京大学,怎能在那无比丰富的图书馆去发现它?这就又要问:我单单到燕大去读书,这是偶然性 还是必然性?这下子,就又牵扯到日军破坏我的南开中学母校与他们反复又破坏我的燕大母校的侵华、抗日的无穷历史因由事故交织而成的特殊现象,而降临到我身上的这段传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细想起来,都包含着“万层”因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确实如此。你与某人某事无缘,就是近已“交臂”,也会毫不相干,连“失之”也谈不上,因为根本不发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与理念。而“缘”,又该如何作出科学解说?我至今还是极盼有人能开我茅塞。

因此我以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这个“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学慕学,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长大些受兄长启迪,爱文学、喜小说,初中高中时期已与《红楼》结下不浅的因缘——在高中时与同窗黄裳天天大谈《红楼》,我说我课余下功夫学英文是要将《红楼》译为外文,向世界介绍(如林语堂之译《浮生六记》);并且还说:我要创造一个新英文字:Redology——红学。

你看,我的红学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后话,不过是一种继续或发展罢了。

首的胡适的考证文章,引发了对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见胡先生写得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竟不可得,深以为憾,就写信来嘱我留意此书的踪影。

我接信后,几乎是立刻,即直入图书馆,去查卡片柜。使我惊喜,此书竟在!燕大图书馆好极了,只填一个小借书单,馆员用吊篮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下来,书在其中!把借书证备妥,附在书的存卡上,签了名(或学号),就能抱回宿舍尽情翻阅。我在馆中借书何止千部,未见老馆员有一丝嫌烦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们。

此刻要说的有三点:第一、记得原书卡上是空白,这多年来没有一人曾借过此书,一奇也。二、

粗读一过,就看见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曹雪芹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有三首涉芹诗)。三、这是清缮本,字迹工整,而由于此本的发现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你问:发现这么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到底有何意义?答复是:这标志着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25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这句话是五十年后回顾学术史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不带任何主观夸张的色彩。

发现之后,我草写了一篇不太大的介绍考论的文章,就放在宿舍书桌左肘处一堆书物的中间,心中并无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嘱的任务之外,即无他念——当时不要说什么“名利思想”“轰动效应”之类,就连发表的意愿也不曾萌生。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军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顾随先生一次来信忽然提到:你课余是否也可练习撰文,如有,可代介绍发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两篇小文寄给了顾师:一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欧阳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杰作与奇迹。另一篇即是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题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订的方面。此二稿,顾先生交付与赵万里先生(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他正主编一家报纸的图书副刊版。赵先生一见拙稿,立即编发了后一篇,而对考欧书的一篇置之弗顾。文章刊出,引起众多人的瞩目。在随后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给我的一封信。胡先生的来信,是赵先生转给我的,我接到时他早已将此信全文编发了。这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

我的红学起步,暂记到此。燕大藏本后为哈佛大学调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图(今国家图书馆)之藏本也。诗曰:残编一卷懋斋存,母教兄言忆旧恩。难忘师情群辐辏,百川归海大文源。

(节选自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拾音阁

民俗摄影的自我觉醒

——评黄复民俗摄影新作《贴近黄土地》

袁毅平

黄复先生是位孜孜不倦于民俗摄影理论研究的摄影人,近来出版了民俗摄影新著《贴近黄土地》,较完整、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民俗摄影的问题,包括民俗摄影的理论基础——民俗学、民俗摄影的特征和创作规律、民俗摄影的价值取向等等,同时,还以大量的民俗摄影作品为实例,结合对各类民俗摄影的创作活动,生动、具体地论述了有关民俗摄影的实践问题,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中国民俗摄影理论专著。

民俗摄影,既是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又是摄影中的一个门类,所以要研究民俗摄影的价值和地位,既要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也要从摄影的整体功能中来考察。作者正是从这两方面来研究民俗摄影问题的。

作者认为,民俗摄影作为一个独立的摄影门类,其任务不仅仅是民俗事实的搜集与记录,还要对其进行分析解释,进而用图像的形式揭示民俗文化的内涵。他特别强调民俗摄影的学术性特征,因为这一特征关系到民俗学、摄影学以及其他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学问,因而要求摄影者必须具有清醒的民俗意识和相对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还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创作作风,以及搜集资料、选择拍摄题材、制定拍摄计划等能力。他认为只有这样,创作的作品才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也才有它的学术价值。

民俗摄影的真实性也是作者特别强调的特征之一。他认为民俗摄影属于纪实类摄影,拍摄形式和内容都应该是真实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丝毫不加干预、导演、伪造乃至后期加工,否则“所拍摄的民俗照片就

会带给读者传递错误的信息”,并可能给有关学术研究造成误导,贻害后世。所以他认为“真实性是民俗摄影的生命”,这也是他把“真实性”作为民俗摄影重要特征的原因。当然,作者非常明确,“强调民俗摄影的真实性,绝不是将民俗摄影简单机械地当做对现实的记录,而是要将民俗蕴含的文化积淀与民族精神聚于瞬间形象中表现出来。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作者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性的理论观点,如把民俗摄影的创作规律概括为:“生活是基础,情感是灵魂,深入是关键,理解是升华。”又说民俗摄影的核心是:“生活是源,百姓是缘,民族文化是根。”读罢本书,从字里行间发现作者十分强调从事民俗摄影应有强烈的“民俗意识”,这主要是为了强化民俗摄影的本体意识和独立地位。由于民俗摄影具有一定的边缘性,人们往往容易把民俗摄影混淆于民族风情、社会生活等其他门类摄影,这就容易模糊了民俗摄影的真正涵义,淡化了民俗摄影的本体观念。

其实在我国,民俗摄影几乎是与我国摄影发展史同步而行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不乏民俗摄影的拍摄题材,同时也不乏反映这类题材的摄影作品,只是一直没有在理论上确立民俗摄影这个独立概念。这些年来,随着民俗摄影的普及,也随着民俗摄影自身的觉醒,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俗摄影的重要作用,但是理论与实践相比还是很薄弱。因而作者有关民俗摄影的理论,尤其是这本《贴近黄土地》的出版,对于民俗摄影的发展很有意义。

(《贴近黄土地》已由三秦出版社2012年出版)

《新论语》

本书将《论语》原有的20篇体例完全打破,从“仁”的定义和内涵出发,以孔子的思想脉络重新结构原文文本,使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融为一体。通过这样的系统性分拆和重构,在没有一字一句增删的情况下,《论语》呈现出全新面貌——孔子思想的逻辑性和深刻性从文本中直接呈现出来:“仁”为核心,“孝”“悌”“信”为其呈现形态,“礼”为其外化形式,学习和修身是其求取的途径,治国和处世是其实践的方式;而孔子对时政的抨击和对各种人物的评论,则如今天的“案例教学”,旨在向弟子们解释和阐发“仁”之内涵,以及在具体事例中如何评判。

(钱宁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苏联解体20年来,俄罗斯社会没有停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追问与反思。本书收集了苏联瓦解前起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近两三年陆续发表的回忆录、亲历者的访谈录、解密的档案资料、学者著述、影像记录等新材料,在此基础上筛选并翻译了最具代表性的30篇辑录成册。有别于一些宏大历史叙事的枯燥和档案解读的支离破碎,本书编者选取权威性、可信性的史料,力图还原20年前那段历史的真实细节和本来面貌,供同行研究、供国人思考。

(李慎明编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放笔丹青——中国书画大家访谈录》

对那些寿登耄耋的大家学人进行访谈,记录下他们非凡人生的所闻、所历、所见、所感、所为、所创,这既是一项文化抢救工程,也是一部当代书画口述史的撰写工程。本书选取《中国书画》“名家访谈”栏目中的精品访谈汇成一册,其中含《许江访谈录》、《冯远访谈录》、《刘大为访谈录》、《贺友直访谈录》、《范曾访谈录》等,并配有其作品的精美插图和采访侧记。

(康守永 薛晓源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福柯思想肖像》

本书是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中文传记。作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福柯及其著作影响世界学术界甚广。他侧重边缘历史的研究,为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新建立了坐标。其知识考古、系谱学、知识——权力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依旧具有重大的影响。福柯的个人经历也颇值得关注,他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风云变幻之间勾勒出那段时间法国学界的气象;他的同性恋形象也使他迥异于其他学人。本书取精用宏,叙事生动,为中国读者了解福柯打开了一扇大门。

(刘北成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费里尼画传》

本书记录了电影大师费里尼的创作历程和生活的脉络轨迹,包括他的马戏团情结、对梦幻与虚构世界的追求、对女人的迷恋等,并配以台前幕后170多幅精彩照片。作为电影艺术殿堂中不得不提及的人物,费里尼以其擅长的隐喻、象征、夸张的电影手法,成就了一系列风格独特、意境深刻的电影杰作,如《大路》、《甜蜜生活》、《八部半》等。本书作者法布里奇奥·博林和卡拉·米勒均为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电影史教授,长期从事电影研究。

(〔意〕法布里奇奥·博林 卡拉·米勒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没有过去的男人》

本书是内地新民谣代表人物、博尔赫斯乐队主唱钟立风的文字集,包含无咎篇、进退篇、有常篇和至柔篇四部分。无咎篇以诗歌、随笔为主,有片断式的记录和白描,也有类似短诗般的直抒胸臆,充满哲思。进退篇有随笔、小小说,还收录了几篇访谈,或是身边朋友的趣事、或是和陌生人的邂逅,笔调细腻、感情真挚。有常篇收录了几篇颇有分量的小小说,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探讨了关于爱情及人性的主题。最后一部分至柔篇以时间为序,收录了作者5张音乐专辑中有代表性的歌词,将歌词赋予文学的诗意,展现出作者这些年的音乐历程。

(钟立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